

# 城郊村落水环境恶化的社会学阐释<sup>①</sup>

## ——下石村个案研究

徐寅 耿言虎

(河海大学 社会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浪潮下,城郊村落发生了急剧变化。环境问题的产生即是表现之一,在此问题中,人扮演着关键角色。而在影响人行为的众多因素中,经济因素发挥着最主要的作用。通过对下石村水环境恶化状况的调查,基于对村民生产方式与谋生手段转变的分析,揭示水环境恶化背后深刻的文化逻辑。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文化逻辑在于科学的“无意识”和“私”的观念,谋生手段转变的文化逻辑在于“生态道德”与“池塘伦理”以及村庄的“生活面向”。研究发现,环境问题的治理“治人”是本,只有改变人的价值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关键词** 水环境;下石村;经济因素;文化逻辑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0)02-0041-04

### 一、引言

环境社会学的核心是研究在人与自然的系统中,人的行为(个体或群体)对自然环境的影响<sup>[1]</sup>。影响人行为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经济因素最为重要。通过在下石村的调查,笔者发现由于城郊村落所具有的特殊性,在环境恶化的过程中,下石村村民的生产方式、谋生方式等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在直接影响着村民。无疑,生产方式、谋生方式都属于经济因素的范畴,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尝试从生产方式、谋生方式两个主要方面来说明城郊村落环境恶化过程中经济因素的作用。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随着农业技术的不断创新,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实现根本性转变,而这种转变无疑会对自然环境产生巨大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趋势不可避免。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且这种趋势在城郊尤为明显。城郊地区,农业生产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汹涌浪潮之中显得愈加渺小,很多地方农业生产甚至已经消失。农业生产的日趋式微、农业收入比重的下降、农民收入结构的

多元化,意味着农民谋生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也在冲击着农民传统的文化观念,进而对农民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产生巨大影响。这些都是城郊村落环境恶化的重要的因素。本文将通过“下石村”这一典型个案的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阐释城郊村落水环境恶化的原因及其文化逻辑。

### 二、下石村概况及水环境变迁史

#### 1. 下石村概况

下石村位于南京市近郊,隶属于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截至 2008 年底,村中共有村民 44 户,人口数约为 170 人。村民多在邻近的高家库工业园或普觉寺公墓上班,家庭平均年收入在 3 万元左右。除了本村居民外,村中还有 10 多户租住于此的外来户,主要是附近村落的拆迁村民及来宁务工人员。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该村仅有农田 6 hm<sup>2</sup>,每人分得责任田不到 0.05 hm<sup>2</sup>。2005 年,为了配合南京市绿化工程,下石村的土地实行集体转租。转租后,土地主要用于种树,不再种庄稼,农业生产从村民的生活中消失。

下石村背靠牛首山,牛首山上的水,顺着低洼的

收稿日期:2010-03-01

基金项目:河海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2008421111)

作者简介:徐寅(1986—),男,江苏常州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城乡社会学研究。

① 本文在选题与论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陈阿江教授的指导,参加下石村调查的还有耿言虎、钟德体、夏宏玉和焦圆圆,特此致谢。

沟渠流入下石村,在下石村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水系。该村中的水系,按照从上到下基本顺序是:牛首山流水→后头坝→下河、上河→茨菰塘→前头坝→长新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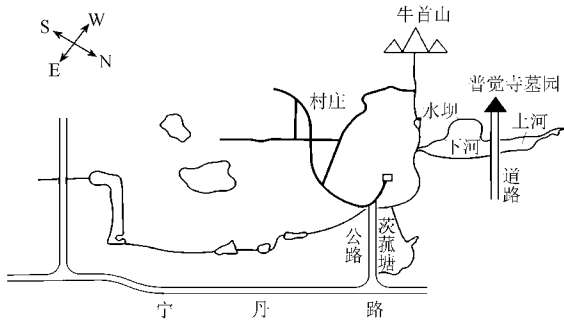


图1 下石村水系分布

## 2. 下石村的水环境变迁史

在下石村的水系中,茨菰塘有着重要的作用。1984年以前,村民饮用水主要是河水,洗菜、淘米等生活用水也依赖于河水,而茨菰塘是当时主要的水源地。1984年村中通上了自来水后,茨菰塘所承担的功能由饮用水转变为生活用水。1990年,普觉寺公墓建立,公墓污水流入了茨菰塘,从此以后村民放弃在塘中洗菜、淘米,而在塘中洗拖把、马桶等,池塘的水质开始不断恶化。相对而言,茨菰塘的情况是比较乐观的,村中另外的几个池塘已经完全成为垃圾的“纳污池”。河水在下石村的用水史中功能在不断退化,可概括为:

饮用水和生活用水 → 生活用水 → 纳污水水  
(1984年以前) (1984年~1990年) (1990年以后)

在下石村,水体的功能由高级向低级转化的趋势是相当明显的。“从利用水体的高级功能转到低级功能,而这样的改变对环境是致命的<sup>[2]</sup>。可以说,下石村的用水史,是一部河水功能的退化史,而河水功能的退化则带来了水污染。

## 三、经济因素与水环境恶化

下石村地处城郊,改革开放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浪潮正侵蚀着这个村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逐渐消亡,村民的收入结构多元化,谋生手段有了根本性变化。这些变化都对村落自然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

### 1. 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与水环境恶化

传统的农业生产是一种生态系统保持平衡的生产,有垃圾而无废物,农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摸索出一条变废为宝的途径。其中一项是对河泥的使用。河泥能为越冬作物提供充足的养分,是传统农业生产中的必备肥料。在下石村,获取河泥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每年冬季将水抽干以后,将河泥挖出;另一种是村民驾船,用特制的泥篓将河泥捞出。

据村长李先生回忆,在1958~1983年的集体化时期,河泥是当时主要的肥料。使用河泥既保证了肥料的供应,也保持了水体的清洁,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生态系统的平衡。

在1984年包产到户以后,河泥逐渐退出了下石村的农业生产。原因有二:一是包产到户以后,集体的生产活动消失,基本劳动单位变成“户”,单靠一户家庭的劳动力无法保证挖河泥的顺利开展;二是化肥替代农家肥。化肥见效快,使用便捷,能有效提高粮食产量。包产到户以后,在普遍追求农业效益的前提下,化肥替代农家肥成了必然趋势。但是,化肥的使用对水环境存在着致命性的破坏,容易造成农业面源污染。

### 2. 谋生方式转变与水环境恶化

传统的中国农民,农业生产是其唯一的谋生方式。改革开放以后,地处城郊的农民逐渐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就收入结构而言,30年前农业生产所得是其收入的全部来源,而目前随着土地转租,农业生产已基本退出下石村人的生活,工资已逐渐成为村民收入主要组成部分。下石村村民的谋生手段,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

以农为生 → 以工为主,以农为辅 → 以工为生

在“以农为生”的阶段中,水质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粮食的产量,村民也格外重视对水的保护。据村民李大爷回忆,当时水塘里基本上没人往里面扔东西,靠“个人自觉”来维持河水清洁。随着普觉寺公墓的开发和高家库工业园的建立,下石村的村民纷纷进入工厂打工,下石村进入“工业为主,农业为辅”的阶段。在此阶段,村民对于水的保护意识有了明显变化。究其原因,在工业收入成为主要收入之后,农业生产在村民生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最明显的事例是普觉寺公墓污染事件。普觉寺公墓建立后,公墓公厕的污水流入了茨菰塘,造成水质急剧恶化。面对这种情况,下石村村民选择了“闹”,在进行了几次堵门、断水行动以后,最终村民获得了每人每年500元的补偿。在笔者看来,经济补偿之所以能够化解村民对水污染的阻止行为,原因有二:一是与处于强势地位的企业相比,村民既面临着专业技术壁垒,也得不到政府和技术专家的支持,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面对企业的排污行为,农民只能通过获得一些物质补偿,来实现一定程度的利益均衡。二是下石村很多村民在普觉寺公墓上班,因此,在排污事件中本身处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阵营,难以达成共识。在谋生手段与水环境之间,下石村的村民以牺牲水环境的代价来维持自己的生计。正如村长所言:“我们这个村是靠山吃山,公墓关了村中要失业

一大半。”谋生方式的转变,使村民不得不靠环境污染来“赢利”。

此外,随着租房的人逐渐增多,房租也成为下石村村民谋生方式之一。其对下石村的环境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一,在下石村,外来人口的到来致使村中人口在短时间内急剧膨胀,生活垃圾、用水量和排泄物增多,加大了有限自然环境的承载量。其二,外来人口不良的用水习惯也对下石村的水质产生了影响。据下石村人所说,外来户用水习惯较差,很多人直接将垃圾倒入河中。

#### 四、经济因素背后的文化逻辑

关于文化价值观念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诸多学者有过论述。美国社会学家林恩·怀特在谈到西方国家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时指出:“我们时代的生态危机就是一种显现的、完全新式的、民主文化的产物<sup>[3]</sup>。在怀特看来,基督教文化的存在是西方生态危机的根源,要改变生态危机的状况,必须改变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环境社会学家陈阿江的研究表明,传统中国社会的规范和生态伦理对保护环境有重要的作用,而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失范”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之一<sup>[4]</sup>。笔者认为:在“下石村”环境恶化的背后,存在着深层次的文化因素的影响。下石村水环境恶化,究其根本,是村民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的背后蕴含着深层次的文化逻辑。

##### 1. 农业生产方式转变背后的文化逻辑

###### (1) 科学的“无意识”

在科学技术与环境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间接关系。正如饭岛伸子所言“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几乎不会面临今天所发生的环境问题<sup>[5]</sup>。下石村的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科技进步无疑是第一驱动力。在科技的推动下,河泥的使用消失了,但化肥、农药的出现能保证粮食的产量,自来水的出现使河水的高级功能有了可靠的替代者,即使河水污染也不会形成没有水喝的窘境。下石村的村民在享受着科技进步成果的同时,却无法发现科技与环境问题之间的间接关系。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下石村村民对于化肥、农药会污染河水并不知情,村民普遍的观点是化肥、农药有助于庄稼的生长,怎么可能形成水污染。在专业知识缺乏的情况下,对科技的盲目崇拜使村民形成了对科技危害的“无意识”。科技进步推动着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而传统农业生产所形成的生产观念,也在科技进步的浪潮中被彻底摧毁了。从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生产观念变为“相信

科学”的生产观念,殊不知在“相信科学”的背后还存在着“科学的隐忧”。科学危害“无意识”的文化观念使村民虽痛心水环境的恶化,却不知自己正是水环境恶化的驱动力,由此也形成了人在“无意识”中破坏水环境的恶性循环。

###### (2) 私”的观念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俗语。谁也不敢否认这俗语多少是中国人的信条<sup>[6]</sup>。在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民的“私”转变为“集体的私”,集体主义价值观占据了主导地位。村民个人属于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的好坏与自身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村民个人出于“私”的考虑很重视对公共物品的保护。茨菰塘作为公共物品,与集体的粮食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代表的是集体利益。因此,对于集体挖河泥,个人是积极拥护的,毕竟对集体的“公”意味着个人的“私”可以得到满足。

随着集体化时期的终结,久被压抑的“个人的私”开始显现威力。茨菰塘属于全体村民所有,村民为“私”,何必去关心“公”呢?村民都在使用茨菰塘的水,却没人提出治理水污染的问题,原因很简单,个人与集体已经脱离了利害关系。对于公共物品,个人出于“私”的考虑,只想索取而不想付出,反正池塘是公共产品,个人只管获取好处,至于后果应该是由“公”来负责。美国学者哈丁在《公地的悲剧》一文中指出,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人的最大化追求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举例说“想象草原对大众开放,估计每个牛郎都会在公地饲养最多的牛只。数百年来,这样的安排都是相安无事,因为部族战争,偷猎,和疾病把人和动物的数目保持在土地承载能力之下。最终,人们长久渴望的社会稳定的一天到来,是醒悟的时候了。这时,公地的内在逻辑无情地导致悲剧”<sup>[7]</sup>。下石村水环境的恶化,可以说是由“公地的悲剧”演化而来的“公水的悲剧”。

##### 2. 谋生方式转变背后的文化逻辑

###### (1) 生态道德”与“池塘伦理”

福斯特在批判当今的环境污染时指出,我们必须建立新的生态文化,以取代我们目前对环境不道德的做法。福斯特认为“毫无疑问没有生物和社区愿意污染自己的巢穴,但社会与自然的长期分割使人们产生了人类只生活在消费场所而不是生产场所的幻觉,以为自然可以被视作外部环境,一个人可以从索取资源并向其倾倒废料的区域<sup>[8]</sup>。在下石村的“以农为生”阶段,村民与土地、池塘等外部环境互为一体。村民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而自然环

境也嵌入到村民的社会生活之中。下石村人知道在农业生产时期保护水质,不污染池塘,维持生态的可持续性。随着土地被集体转租,村民的谋生方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逐渐转变为“以工为生”;“农民”变成了“工人”,而农业生产已经从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与此同时,农业所赖以发展的土地、池塘等自然环境与村民生活也逐渐分离开来。自然环境成了与村民无关的外部因素,下石村变成了村民消费的场所,而非生产场所。池塘边随处可见的生活垃圾也表明村民的生态道德已不复存在。

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土地伦理”这一概念。福斯特的“土地伦理”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被看作为商品,是一种牟取财富的手段,要穷尽一切办法带来利润。在下石村的调查中,笔者隐约地看到了作为“土地伦理”变种的“池塘伦理”在环境恶化中发挥着作用。在面对普觉寺的“公墓污染”污染时,村民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将水治理好,而是能从公墓获取多少补贴。最终,村民也是以牺牲水环境为代价换来公墓的补偿和提供就业的机会,池塘水污染被村民作为一种讨价还价的筹码,从而在与公墓的博弈中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农业生产形成的保护水质的观念,已经被现在的“物质观念”所取代。

## (2) 向内”与“向外”

村庄的“生活面向”是指“村民建立自己生活意义和生存价值时的面向<sup>[9]</sup>”。笔者看来,生活面向实际上是村民如何看待自己与村庄或与村庄中其他村民关系的问题,分为“向内”和“向外”两种类型。“生活面向”呈“向内”特征的村庄整合度高,村民有归属感,把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寄托在村庄内。具有“向外”特征的村庄,整合度低下,村民无归属感且逐渐“原子化”,他们把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寄托在村庄外,村庄如同一盘散沙。

“向内”的村民关心村庄的公共事务,关注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下石村的村民是喝茨菰塘的水长大的。茨菰塘尽管已被污染,但村民们对水塘的感情还在,因此或多或少比较注意自己的用水行为。然而对外来人口而言,他们的生活面向具有“向外”特征,下石村仅仅是其生活中的一个驿站,对所居住的村落缺乏归属感。而这种归属感的缺失将对水环境造成两方面的影响:首先,与本村人相比,外来户对于池塘用水缺乏保护意识,并没有把护水意识内化于自身。外来户张先生直言“水的好坏关我什么事,我不是本村人,也不知道什么用水习惯。”其次,外来户的增多也增加了环境治理的难度。外来户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

他们对于环境有不同的价值观。传统社区的“向内”保证了村民环境价值观的趋同性,而外来户的到来使“向内”受到了“向外”的冲击,村内成员的环境价值观无法统一,加大了治理环境的难度。

## 五、结 语

社会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单纯地考察经济因素的作用,而在于透过对经济因素的考察来透视其中蕴含的内在文化逻辑,并提出社会学的理解范式。下石村个案的社会学研究报告告诉我们水环境的恶化有多方面的原因,究其根本还在于人的行为。下石村水环境恶化的过程,是与村民生产方式、谋生方式的转变同步的,这些转变直接导致了村民生态价值观与行为的变化。从根本上来说,它们所折射出的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人们传统的生态价值观崩溃了;“相信科学”、“物质观念”等所谓的新的生态价值观却无法指导人们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人们不知道自己所知的生态知识很少而自以为是<sup>[10]</sup>。因此,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树立起一种符合现代社会的生态价值观来为保护环境服务。建立新的生态价值观,目的在于“治人”,而“治人”则在于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要建立新的生态价值观,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大力宣传生态知识,走出生态认识误区,让人们对所处的生态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其次,要挖掘传统生态价值观中的现代因素,将其与工业社会的现实紧密结合,来指导人们的生活。

## 参考文献:

- [1] 马戎. 必须重视环境社会学[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4):103-110.
- [2] 陈阿江. 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J]. 学海, 2007(1):36-41.
- [3] WHITE L.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J]. Science, 1967, 155(3767):1203-1207.
- [4] 陈阿江. 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东村个案研究[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1):62-69.
- [5] 饭岛伸子. 环境社会学[M]. 包智明,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76.
- [6]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85:21.
- [7] HARDIN 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 Science, 1968, 162(3859):1243-1248.
- [8] 福斯特.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 耿建新,宋兴无,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80.
- [9] 贺雪峰. 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M].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9.
- [10] 陈阿江. 论人水和谐[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4):19-24.